



映入西方的近代中国

《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研究
(1927—1940)

李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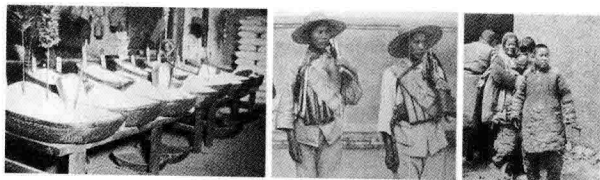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映入西方的近代中国

《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研究
(1927—1940)



李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映入西方的近代中国:《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研究:1927~1940 / 李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161-5739-8

I. ①映… II. ①李… III. ①报纸—新闻报道—研究—美国—1927~1940 IV. ①G21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124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凌金良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张雪娟

出 版

社 址

邮 编

网 址

发 行 部

门 市 部

经 销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242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于历史——中国近现代历史和西方传媒对中国的报道历史乃至美国这一西方头号强国的中国形象史——的浓厚兴趣，又体现了她对于博士论文创新性的追求，试图通过研究西方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机构之一的一名在中国报道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驻华记者之中国报道，来为“揭示西方媒体如何报道（中国）和建构中国（形象）提供一个更加微观和细腻的视角”；而这位记者的驻华采访实践及报道作品又是中国大陆传播研究界对国际传媒人士的中国报道研究中当时较少考察的，这使得李莉的研究选题的展开，具有较大的开拓空间和较大的价值。

记得当初李莉首次提出这一博士论文选题时，作为导师的我曾经就是一项微观细致的研究的工作量问题，与她进行沟通。在肯定这一选题的意义的同时，我向她指出了由于时隔数十年，对这位当年的《纽约时报》首席记者涉华报道的研究，可能会遇到这些报道的文本收集困难的问题；而这位记者在华时间跨度较长，且是一位勤于采访、写作的多产的传媒人士（数据统计显示，从他1927年供职于《纽约时报》起至1940年离开中国，这位记者发表了1000多篇涉华报道），其涉华报道又是英文的，对之研究工作量很大。令我欣慰的是，李莉没有遇困难而止步，而是坚持知难而上，着手资料的收集、处理，形成思路撰写以“映入西方的近代中国：《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研究（1927—1940）”为题的开题报告，并孜孜矻矻地阅读哈雷特·阿班的涉华报道，在此基础上对之进行探讨，透视这位记者笔下的中国形象，将之归纳为一种“危机中国”形象，一种在当时历史语境下对外部世界的中国认知颇具影响力的西方媒体建构的中国媒介镜像。从博士论文应有的学理上的贡献的角度来说，更加值得一提的是，李莉的研究并非止于考察哈雷特·阿班报道文本的总体倾向与特征及其所折射出的“危机中国”的媒介镜像，而且还试图探讨分析这些报道、这种媒介镜像背后的多种影响因素和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探析这样一位西方主流媒体的重要驻华记者为何在原有

序 言

来自西北大学的李莉是我调入上海大学执教后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也是上海大学获准建立传播学专业博士点后该博士点招收的首批博士生之一。欣闻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即将付梓出版，作为她博士生学习阶段的导师，我深感值得为她庆贺，因而当她提出希望我为之写序言时，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当今时代，“全球化”与“信息化”已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全球化呈多维度发展态势强劲，信息革命一波又一波浪潮席卷全球，这些乃是当下世界范围的社会现实的重要特征。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互联网的横空出世和新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异军突起，把世界性交往推进到崭新的发展阶段。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的世界文化大潮不可避免地拍打着发展中国的文化之岸，全球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际环境空前开放。国际舆论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日益重要。中国迫切需要加强对国际舆论的研究，加强对于在国际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国际新闻传播的研究。即将出版的李莉的博士论文《映入西方的近代中国：〈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研究（1927—1940）》正是国际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一项较为具体细致的研究。

作为国际传播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李莉关注国际传媒及其从业人员建构的中国形象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形成围绕《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 1927—1940 年的中国报道之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却是她的“特别选择”，这种选择，既反映了她对

的中国传播学研究界对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及其塑造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并未受到高度关注,从而将这篇博士论文的研究推向了一定的深度。这些影响因素,被归纳为包括阿班作为一个美国人所接受和信奉的美国传统价值观、美国意识形态作为参照框架,美国的外交政策选择,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纽约时报》国际新闻生产的组织规范,其他利益集团的压力,等等。

可以说,李莉这篇博士论文的撰写过程,见证了她沉下心来,静心于案头功夫,扎扎实实地对选定的研究内容的文本进行阅读、梳理、整理的艰难尝试,也见证了她学而思,将研究内容置于历史语境下反复思考、挖掘其与多种影响因素的勾连的可贵努力,还见证了她为了使“美式‘中国观’的历史发展轨迹显得更加完整和流畅”而所做的“拾遗补阙”式的细致工作。我以为,其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展示出了她的创新勇气,也展示出了她脚踏实地的工作精神。希望她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继续保持这样的勇气和精神。

在传媒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传媒的国际传播是影响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影响国际舆论的重要因素。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及其动态发展,同其传媒尤其是其主流媒体的长期中国报道实践紧密相连。而哈雷特·阿班作为供职于《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进行国际新闻采访报道实践的十多年,正逢中国国内时局动荡纷杂、变化深刻而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重要历史时期,正逢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作为驻华记者从事涉华报道的阿班,对那段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各种重大事件进行了报道,还创造了几个“第一”:根据李莉论文中征引的有关研究成果,阿班作为英美记者之一第一个向世界报道“西安事变”这一重大事件;他作为一名外国记者第一个在日本占领南京后把日本侵略者对待中国军民的暴行传播到国外媒体。此外,阿班的新闻传播实践中还表达出对中国问题、远东时局的见解和分析。显然,对这样一位外国传媒人士的中国报道和中国问题相关论著的研究,对其涉华报道当时所建构的“危机中国”形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媒体的中国形象史上的一个重要部分。

然而，诚如李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所分析指出的，由于一系列原因，阿班的中国报道并未受到充分的关注，这些原因包括：时机因素和传统视野的局限。时机因素造成了对阿班及其涉华报道的一定程度上的“历史尘封”——他因离开中国于1940年末而没有赶上美国新闻传媒在中国有较大作为的20世纪40年代，而且他也不属于学院派（如“密苏里派”）的美国来华记者，他的中国报道实践展开于“美国还未把注意力真正地投向中国”的时期，因而不像那些“被时代推向历史前台”的20世纪40年代学院派的美国记者那样在美国本土研究界对其驻华记者的研究中受到高度重视。而在中国大陆研究界对1949年前西方记者的涉华报道研究中，传统视野的局限则使研究界偏重对左翼立场的记者及其报道的研究，在相当长时间内传统的思维定式往往偏向于侧重选择研究明显具有同情“红色中国”的左翼立场的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斯特朗和史沫特莱等人及其中国报道实践，而阿班作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主流报纸的驻华记者，在传统视野下则未得到我国大陆研究界的充分关注。由此看来，李莉的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可以为解读西方媒体国际新闻实践的多元化的特质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已走过36个年头。“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了解世界包含如下部分：了解国外媒体传播的中国形象，了解这种媒介镜像折射出的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中国在外部世界的媒介镜像和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其形成的过程是同一批又一批国外传媒人士的涉华报道分不开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纽约时报》历史上一度的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的中国报道，可以为我们提供国外媒体传播的中国形象史上和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史上的一个具体案例，从而有助于我们沿着这种形象、这种认知的历史轨迹，去对之获得深刻的了解。

博士论文完成后，李莉在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回到西北大学执教后，又对其博士论文进行了进一步的推敲修改，

从而形成了今天的书稿。当然，李莉作为一名年青的研究者，还有待于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不断增加研究积累，提升学术功力，在学术上不断进取，一步一步走向成熟。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支持其书稿出版之举，无疑将鼓励她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

攻读博士学位的阶段有期限，学位论文或著作的撰写也有尽头，而学术研究却是无涯的。在学术的道路上不断寻找新起点、攀登新高峰理应是身在学术生涯中的人士之无悔选择与不懈追求，以及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愿以此与李莉共勉。

张咏华

2014年12月25日于上海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研究缘起	(1)
第一节 国际新闻生产与国家形象传播	(1)
第二节 当代西方涉华报道与中国形象研究的现状	(6)
第三节 哈雷特·阿班的中国报道与近代中国形象的 建构	(15)
第二章 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的总体特征	(27)
第一节 报道的总量与频率分析	(28)
第二节 报道的议题类别分析	(37)
第三节 发稿时间、地点与版面分析	(46)
第三章 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的主题框架	(55)
第一节 框架分析	(55)
第二节 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的框架呈现与表达	(59)
第三节 作为主导框架的“危机中国”形象	(80)
第四章 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的案例分析	(87)
第一节 有关“西安事变”的报道	(87)
第二节 有关日本侵占上海的报道	(99)
第三节 有关新闻自由的报道	(115)
第五章 哈雷特·阿班“危机中国”形象建构的逻辑、 策略与意涵	(126)
第一节 中国形象的历史性嬗变与逻辑	(127)

第二节 “危机中国”形象建构的话语策略	(138)
第三节 “危机中国”形象的意涵	(162)
结语 无法超越的他者	(172)
附录 哈雷特·阿班中国报道的样本目录	(181)
参考文献	(254)
后记	(267)

第一章 研究缘起

国际新闻与国家形象塑造这一关系命题的形成并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绝非偶然，而是深植于国际新闻传播社会影响力的日益彰显和提升以及在这一发展趋势下对国际新闻生产和传播活动所进行的时代性反思。本书选择哈雷特·阿班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缘于对中国当代西方涉华报道研究现状的反思。二是基于《纽约时报》和哈雷特·阿班本身所具有的研究代表性和典型性。

第一节 国际新闻生产与国家形象传播

纵观人类历史长河，不同国家之间的信息交往源远流长，从文字诞生，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国家建立伊始，国际间的信息交流现象便相伴而生。早期信息传播所依赖的方式主要是人际传播，一直到17世纪新闻事业的完整形态出现^①，以报纸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才开始成为国家间信息沟通的主要渠道，国际新闻报道崭露头角。

国际新闻是新闻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超越了国家界线并具有跨文化性质的新闻，或者说国际新闻是新闻在国际间的流动”。^② 根据洛特费·马赫兹（Lotfi Maherzi）的观点，国际新闻很

^① 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公元1500—2000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② 刘笑盈：《国际新闻史研究论纲》，载蔡帼芬、徐琴媛主编《国际新闻与跨文化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早就以外国消息的形式在早期的不定期报刊中存在,它不仅是报刊新闻内容中绝对重要的部分,而且对新闻本身的发展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①从15世纪末一直到19世纪中期,在国际新闻早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由于传播技术的限制,国际新闻对世界的影响力相对来说还非常有限。至19世纪中叶,在通信技术的引领之下,世界上出现了最早的一批西方新闻通讯社^②,它们的诞生促使全球新闻传播体系得以迅速建立和发展,国际新闻传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20世纪以来,伴随着海外传媒机构和驻外记者的不断出现和日渐增加,国际新闻发展成为传递国家之间信息的重要渠道和塑造民族国家形象的关键因素。

历史地看,西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出现与近代报刊和国际新闻的发展几乎同步。15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不仅见证了近代报刊的出现和发展,也目睹了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崛起。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国际新闻传播对民族意识的形成以及民族国家概念的建构和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③正是基于此,国际新闻生产与

① [法]洛特费·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传媒与新技术的挑战》,师淑云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08页。

② 1835年,世界上最早的通讯社哈瓦斯社(法新社前身)在法国巴黎成立,1848年,美国“港口新闻联合社”(美联社前身)在纽约成立,1849年,德国沃尔夫社在柏林成立,1851年英国路透社在伦敦成立。这四大通讯社在1870年达成了瓜分世界新闻市场的“三社四边”协定。

③ 西方的历史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的专家对民族国家形成的自然过程进行了驳斥,揭示了民族国家形成的社会建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信息传播的功能和意义。比如本尼克·安德森指出,“民族的存在,依靠的是人们对于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某种社会一心理归属,现代民族概念的形成,得益于机械印刷机的出现和由此所出现和产生的所谓‘印刷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通过统一的印刷字体,形成了一种标准化的读写模式,所有归属于某一特定民族群体却永远都不能见面的成员因此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使得在各成员之间形成一种集体意识成为可能”。凯利在对美国形成的研究中提出,美国“直到铁路和电报把每个城镇随时随地联系在一起”、绘制出“一幅空间地图,同时也是一幅可往来的地图”之后,才巩固成一个大大陆性的政治性政治和文化实体。(Carey, 1997)这些研究都说明了传播和交通技术的发展是如何影响国家的形成和建构的。(参阅斯蒂芬·B. 科若伏特·威尔利《全球化语境中重新思考国家性》,钟瑾译,金冠军、孙绍谊、郑涵主编《亚洲传媒发展的结构转型》,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8页。)

国家形象建构这一命题才具备了讨论的合法性基础,也就是说,国际新闻传播与民族国家形象之间具有一种客观的、历史的关联性。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讨论的国家形象主要以“民族国家”概念为基础的。众所周知,在西方的民族国家形成之前,所谓的国家形象实际上是指古代的封建帝国形象,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内涵,因为从15世纪开始到法国大革命这段时间,起源于拉丁文“natio”的“民族”才开始以“nation”(nacion, nazione)的面目出现在当地的语言中,且具有了政治的含义,到了波兰被瓜分和法国大革命时,“nation”开始成为“country”(国家)的同义词,而且开始具有了与人民(people或peuple)相对立的意义。^①

有鉴于此,研究者们这样定义了国家形象的概念,比如“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②“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即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③“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是国家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④“国家形象是一国国内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包括政府信誉、外交能力与军事准备等)、经济(包括金融实力、财政实力、产品特色与质量、国民收入等)、社会(包括社会凝聚力、安全与稳定、国民士气、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科技实力、教育水平、文化遗产、风俗习惯、价值观等)与地理(包括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可以分为国内形象和国际形象,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

① 王联:《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② 杨伟芬:《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③ 李寿源:《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大众传播独特的风景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④ 管文虎:《国家形象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异。”^①“在物质本源基础上，人们经由各种媒介，对某一国家产生的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总体感知。”^②可以发现，当代研究者已经为国家形象进行了多种多样的界定。但是，无论这些有关国家形象概念的表述如何不同，国家形象的主体都是指具有政治民族主义意涵的主权国家，正如张昆、徐琼所言：“这种评定和认定，来源于主权国家的客观实在，是国家实在的主观反映。”^③同时，国家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世界交往中的国际舆论，是民族国家间交流互动的产物。可见，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国家形象建构和传播的前提和基础。

就中国而言，近代民族主义和国家概念的形成明显晚于西方社会。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才开始真正进入封建帝国的瓦解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阶段，也就是从“家天下”转变到中华一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相当复杂的^④，它并不是西方那种以资产阶级革命为背景，以平等、自由、民主等政治认同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而更多的是一种缺乏政治底蕴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及在传统的民族感情支持下“衍生出来的对‘西方’的爱恨交加的感情，以及反传统的民族主义”^⑤，这种民族主义虽不乏“对真理和价值的世界主义理解”^⑥，却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此相关，近代中国的国家概念也具有独特性，它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中华和以政治认同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构成的复杂混合体，是古代中国的历史积淀以及包含历史变迁中新的政治和文化因素的认知统一体。可以说，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概念的形成充满了矛盾性和复杂性，充分呈现了历史和

① 孙有中：《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国际论坛》2002年第3期。

② 刘继南、何辉等：《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③ 张昆、徐琼：《国家形象刍议》，《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

④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6—547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

现实的冲突与博弈。

因此,相比与其他历史时期,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更具研究代表性,它拥有更加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意涵,这一时期的国家形象既不同于传统的中华帝国形象,也不同于今天完整而独立的当代中国,而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一种典型话语的表达和呈现,是中国重大历史转折期的表征和见证。

特别是以中国的对外形象,比如西方的中国形象认知发展来看,中国的形象建构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13世纪到18世纪中叶,西方的商人、作家、学者和传教士等是中国形象建构和传播过程中的重要角色,而诸如文学、绘画以及宗教哲学思想著作等则构成了承载中国异域形象的重要文本,这一时期属于西方中国形象建构和传播的早期阶段,也是西方不断乌托邦化中国形象的历史时期。然而,在1750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开始经历一种巨大的认知转折——从美好的东方神话迅速蜕变为丑陋落后的东方,西方的中国形象建构与传播迅速进入了意识形态批判的新阶段。此间参与中国形象塑造的重要角色开始由军事指挥官、外交家和驻华记者等来替代和扮演,而文本样式则开始扩大到基于直接经验的军事报告、外交文件以及新闻报道。尤其在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传媒在中国的不断渗透和发展,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迅速增长并逐渐成为中西文化交往过程中一种等价甚至超越文学、绘画等方面的重要文本,在西方的近代中国形象建构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我们不难想象,近代中国向一元化民族国家整合过程中的复杂现实与西方对中国认知上的巨大转折二者会在中国对外形象建构和传播问题上产生出何种发人深思、碰撞和交融的景象。

诸多的相关研究已经发现,西方对近代中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东方描述,而是一整套有关西方思想结构、知识构成以及文化权力的庞大体系,它包含意识形态、文化结构、话语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

所揭示的那样：西方的东方形象体现着深层的权力结构关系。^① 因此，有关中国形象问题的研究就不仅仅是关乎世界如何看待中国的现实问题（西方的近代中国形象怎么样？是错是对？是好是坏？），而是成为一种有关西方如何理解和建构近代中国概念的重大政治和社会理论问题。

此外，通过西方所建构的近代中国形象的这面镜子，我们还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更加全面地理解西方。凡此种种，都将有助于当代中国的自省和自强，更加有助于我们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把握自己的未来。正如乐黛云所言：“对于今天我们重构自己的文化传统，参与世界文化的总体对话来说，认清‘中国形象’几百年来在国外的变化，显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②

第二节 当代西方涉华报道与 中国形象研究的现状

从国际上看，当代有关国际报道与中国形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90年代。以国外研究为例，1987年出现了麦金农（Mackinnon）和傅利森（Friesen）的《中国报道：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美国新闻口述历史》^③，1990年阿曼达（Amanda）的《在美国的中国记者：浪漫者和愤世者》^④，以及1992年贾斯珀（Jasper）的

① 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② 乐黛云：《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序史景迁〈北大演讲录〉》，载[美]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廖世奇、彭小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③ Stephen R. Mackinnon, & Oris Friesen, *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④ Bennett Amanda, "American Reporter in China: Romantics and Cynics", in Chin-Chuan Lee, ed., *Voice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0.

《在中国报道中的意识形态偏见》^①、麦金农的《美国记者与战时中国（1937—1945）》^②和尼尔斯（Neils）的《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③等，他们着重探讨了美国媒体和记者在中国报道方面的历史经验、态度取向和意识形态偏见等问题，为评估美国媒体的中国形象建构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及研究视角。

同期，在中国台湾地区则较早出现了一批相关的专业性研究成果，比如赵怡的《美国新闻界对中国戡乱战争报道之研究》^④、黄美珠的《美国纽约时报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及言论态度之研究》^⑤、梁冠凯的《〈纽约时报〉报道中华民国形象之研究》^⑥等。其中，赵怡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探讨了1949年美国新闻界对中国内战的报道，考察了美方涉华报道的内容偏向、言论色彩以及政治立场取向等问题，是较早采用量化方法探究涉华报道的一个典型研究。黄美珠则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1978年至1979年间《纽约时报》上的全部对华报道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纽约时报》在中国报道方面的态度立场和言论色彩；同年，梁冠凯的研究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重点分析了1976年至1984年间《纽约时报》对台湾地区的新闻报道，阐释了《纽约时报》在台湾形象塑造上的注意力偏向及评价趋势。这些研究较早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几个不同历史时期

① Becker, Jasper, "Ideological Bias in Reporting China", in Robin Porter, ed., *Reporting News from China*,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2.

② [美] 麦金农：《美国记者与战时中国（1937—1945）》，载张文宪《民国档案与民国学术讨论会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577页。

③ Neils, Patricia, *China Image in the Life and Times of Henry Luce*, Savage: Roman & Publishers, 1990.

④ 赵怡：《美国新闻界对中国戡乱战争报道之研究》，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

⑤ 黄美珠：《美国纽约时报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及言论态度之研究》，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1985年，“台湾国家图书馆”“全国博硕士论文资讯网”（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

⑥ 梁冠凯：《〈纽约时报〉报道中华民国形象之研究》，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1985年，“台湾国家图书馆”“全国博硕士论文资讯网”（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